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

翻译的历史与翻译的地理

袁筱一

我对周煦良的兴趣，好像是从他译的毛姆开始的。《刀锋》里频繁出现的“晃膀子”倒是并未引起我的不适，因为我多少有些向往那个时代的现代汉语译者，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很自然地就用非常生活的语言，让发端时期的文学翻译将同样在发端时期的现代汉语生动地保留了下来。真的令我回味的，是他在译本序言中很淡然地说：“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看到这句话，我突然有点理解他对毛姆的选择了。这种调性，是毛姆的，也是周煦良的。只是看周煦良的人生轨迹，用卞之琳在他去世之后的回忆文章的话来说：“基本是书生，却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比毛姆的行动能力怕是要强很多。但反过来说，从周煦良现在已经淡去的声名，可见得他在自我价值的问题上，与毛姆的通透有的一拼。

的确，在华东师大那么多年，我很少听人谈论周煦良。对我而言相隔甚远的他最初只是一个名字，被镌刻在新校区的大师榜上。但是进入了他的文字，我倒是慢慢地觉出他的亲切来。他不像同在上海的傅雷，在文学翻译的历史上是那样耀眼的存在。他甚至在文学的趣味之外，还会去译《神秘的宇宙》这样的天体物理学的著作。这位“民主党派的高层人物”(同样是卞之琳语）在做完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第一届系主任之后不久，就进入政协任职。想来，能够有幸听到过他的课的人应该是不多了吧，至少在身边可接触到的范围内是不多了的。

可传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旦一个名字在某种意义上闯入记忆，就会不经意间一次又一次遇见。就连前阵子猛读李健吾时也遇见了：韩石山的《李健吾传》提到抗战胜利之后活跃的上海文协，成立大会后紧接着就餐娱乐，活泼泼的一群人用方言热闹闹地读诗，说“周煦良用四川话和北京话尝试着背诵自己的诗篇”。我又顿时觉得很有兴味。周煦良是诗人，家学渊源的原故，对旧体诗很有心得，但在对新文化的坚定信仰中又拒绝写旧体诗，只坚持用译诗的方式找寻新诗的可能性。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学信仰，而中国的新诗，或者说新文艺，也是大量的周煦良们努力的结果。如此说来，翻译应该也是周煦良诸多行动之一。

是啊，谁没有过自己的好时光呢？有理想的，充满活力的时候。哪怕世事不一定遂了人愿。这才想起周煦良终究是那一代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的专家：卞之琳、李健吾，还有傅雷的那一代。但是为什么翻译史又好像忘记了他的存在呢？乃至即便是博学而志趣广泛的前辈陆建德，有次也专门问我周煦良是不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过教”。于是我开始挖掘“家谱”，却意外地在“家谱”上又发现了很多名字，仅仅举我最熟悉的法语文学，就有《红与黑》的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女翻译家罗玉君，还有专译莫泊桑的李青崖。

不用等到“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成立，这册“家谱”就翻开了第一页。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已然涌现出了一代要通过翻译找寻救国之道的前辈，这总与大夏或者光华坚守“光大华夏”和“日月光华”的信仰却并不一味排斥他者文化的理念相关。否则，又怎么解释当时在大夏读经济系的戈宝权最后却以翻译立世，将高尔基“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般“高傲地飞翔”的海燕送入一代人的诵读记忆；又怎么解释罗玉君从大夏毕业之后，成为第一批留法的女博士，回国来毫不犹豫地将根落在华东师范大学，默默只是尽一个译者，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最朴素的义务呢？就连周煦良，也是放弃了光华大学化学专业，转到爱丁堡去读的文学硕士，横跨了文理。这一代人当中最小的，是今天仍然健在的任溶溶，译了一辈子童话，写了一辈子童话，任世事变化，兀自童心不变。

甚至不仅仅是文学。《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郭大力出自大夏大学，也是从化学转攻哲学与经济学；为毛主席和斯诺做过翻译的吴亮平，《反杜林论》首个全译本的译者当年也是从大夏投奔革命；任教于华东师大的著名数学家程其襄在用一本自己主编的《数学分析》奠定了中国高师系统的数学分析理论之前，却也没有忘记将《马克思数学手稿》或是《几何基础》这样的德国数学基础著作翻译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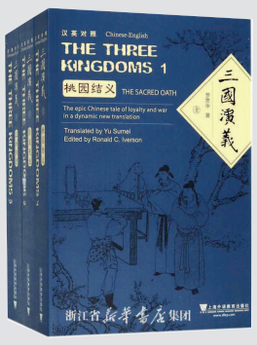
但是散落在漫长而广阔的中国翻译历史里，很难让人发现这些分别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事实之间的关联。便是我这样真正意义上与他们有学缘关系的后辈，也很难将自己与他们联系起来。二三十年前做《红与黑》的翻译研究，罗玉君的名字和文字在我眼前出现了无数次，但简单简历中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除了带给我一点点疑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就也在研究中过去了。在这一点上，我远远没有陈丹燕有良心。在一篇文章里，她动情地写道：“我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得到王智量老师在说到普希金的长诗，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雪中，跟着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

如果不是良心的事情，我为自己找的理由是：比较起翻译的历史，翻译的地理总是更为模糊，更难确定边界。翻译家是文化的旅者，翻译这回事情更是跨越边界的活动。在翻译的地理上，我们一向采纳的是更加宏阔的，语言的边界。因而我总是最先想到把自己“厚颜无耻”地添在傅雷—李健吾这条用法语文学串起来的传承之线上，却很少会想到我和并未谋面的戈宝权、周煦良、罗玉君，或是再晚一些的叶治(主万)、孙大雨、虞苏美等老师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他们翻译的普希金、毛姆、司汤达以及纳博科夫、莎士比亚给了我最初的外国文学教育。他们的译本，也和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一样，比任何一本外国文学史都要来的生动和真切，被抹去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进入同一个汉语构成的文学共和国里。

所以，同样未曾谋面，我和傅雷或李健吾之间的连接真的要比和他们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吗？我突然之间有些拿不准了。当模模糊糊地想着，“晃膀子”也曾经是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甚至也像拉里那样，告别了熟悉的，看上去更应该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当读到“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这样的字句，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啄了一下，觉得用自己一辈子的文字去换来别人的这一段文字也是心甘情愿，我还是说服了自己，我的的确确，从气质和命运而言，是注定要在丽娃河这一翻译地理的囿定下，去继承这段翻译的历史的。这种奇妙的命定，也可以解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既接纳了热情执着的王智量，也接纳了恃才傲物、“人见人不爱”的孙大雨，接纳了并无教学与研究经验的叶治——在翻译的王国里，他更以“主万”的笔名立世。然后，再过二十余年，他们也接纳了用五年的时间在外面“晃膀子”的我。

以融入时代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寻找还未曾显现的可能性，我想，这应该就是丽娃河畔的翻译家赋予自己的使命吧。噢，不，“使命”这个词也许在他们看起来也稍微大了一点，他们的所有野心或许就只是成为“一小片温暖”，个人的，或是集体的；文学的，或是科学的。即便这样的“一小片”成了不足以道的微光，但这又何妨？因为文字是真实的，而不是影子。

《红与黑》
司汤达 著 罗玉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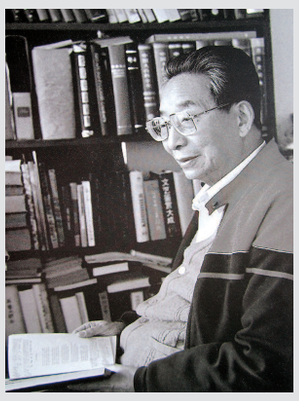


《三国演义》(汉英对照)
罗贯中 著 虞苏美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译者从来就是隐形的存在。一个好的译者，固然有被读者记取的可能，却并不会将“名垂译史”当作自己唯一的追求。他们以沉默之姿，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维系着语言—思想这一多样的，坚韧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推出“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的栏目，绘制一幅群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从华东师范大学走出的这些低调、简朴、从未失却初心而又不乏个性的翻译家。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在记取中更好地前行。

——编者



◀ 从左至右分别为孙大雨、戈宝权、周煦良、郭大力和夫人

典籍翻译想要取得成功，可以依靠的惟有译者自身的功力。
只有一部署名译作《三国演义》的虞苏美提醒我们思考：

什么是译者？什么是成功的译者？

孟令子

华东师范大学有出翻译家的传统：早有周煦良、孙大雨、罗玉君等；俄苏翻译家王智量、朱逸森跨越了世纪，至今仍然健在；稍晚一点也有叶治、黄源深、周克希、张春柏等；甚或当下也是新人辈出，在译坛上自呈一抹亮色。

虞苏美和这些“大名”相比，似乎是“名不见经传”的。第一次遇到虞苏美这个名字，是从翻译系发给老师们作为研究和教学材料的《三国演义》汉英对照本上，出于好奇，去“百度”了一下，发现竟是外语学院的退休教授，心里不禁一动：我在外语学院几年间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擅交际。网络上有关虞老师的信息少得可怜，《三国演义》是唯一一部署她名的译作——果真是“名不见经传”，心里不禁又一动，脑海中迅速出现另一位女性，《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也是仅凭一部作品名垂青史，且她的一生为人所知的也很少。随后虞老师的译文成为我上课中使用的材料，有关她的故事似乎到此为止了。直到今年初，网上忽有人声称虞译本乃是抄袭英人邓罗的译本，言之凿凿。我愕然且愤然，虞老师为中国文学外译做出了足以名载史册的贡献，不料身后却有此无妄之灾。

虞苏美老师的《三国演义》属于校译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新翻译，这一点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版中，负责审订的美国人Ronald C. Iverson已有说明。但译本署名虞苏美译，似乎与一些人理解中的译者身份不符。究竟什么样的翻译行为够得上“译者”的名号，业界并没有规定，译者身份的获得有一些客观因素，也有一丝默许的味道，但所有做法翻译史上必然是能找到先例的。我国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林纾(林琴南)，并不懂英、法、德、意等外国语言，他的所有译文都是在懂外语的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合作者将原文大意翻译给他，他再对合作者的译文进行调整、改写，形成最终版本。如今，“林译”作为一种客观事实与风格已成为现代翻译文学发轫期的一段神话。再如：为中国文学外译贡献了大量译作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他们的翻译往往是由杨宪益先从汉语译成英语，再由戴乃迭(她是英籍)润色英文。杨、戴最为人熟知的是《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当今，由于翻译技术的“横行”，译者身份更为暧昧。近年来翻译软件质量高度提升，谷歌翻译、DeepL等翻译软件在质量评估中已经持平甚至超越人类译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翻译软件处理一些技术类文本，再由人类译者对机器给出的译文进行译后编辑，使之更为准确流畅，在翻译服务界已是流行的做法。由此来看虞苏美老师翻译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对邓罗译本的校译，但她进行重新翻译的地方不在少数，粗略估算，总也有三四成，再加上翻译的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一般人轻易不敢动手的典籍，拥有邓罗译本版权的美国Tuttle出版社坚持给她署名就显得不仅合情，更合理。

虞老师不仅是堂堂正正的译者，还是成功的译者。虞译本在国外读者中的反响超过前两部全译本及其他节译本。《三国演义》迄今为止共有三部英文全译本，第一部是英国驻上海海关官员邓罗(C. H. Brewitt-Taylor)的译本，1925年在上海出版，主要目的是便于当时的中国人学习英语，故而译者没有添加任何注释和说明，只有“赤裸裸”的译文。第二部1992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美国纽约大学中文教授罗慕士，这一版本是为国外读者研习三国及中国历史之用，是典型的“深度翻译”，包括令人咂舌的一千多个注释，一篇洋洋洒洒长达百页的后记(见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主要人物列表、历史事件年表、官衔头衔译名表以及十多幅地图等其他辅助性资料。这两个译本对于《三国演义》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有不少错误和令人哑然失笑的地方。原著中汉语文化专有的名称、头衔、物件、表达方式等俯拾皆是，在翻译这些时，邓罗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用拼音音译了很多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概念，导致译本略显诘屈聱牙，有时甚至不知所云。罗慕士则倾向于归化策略，将汉语文化中独有的意象翻译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失去了原文特有的内涵，譬如：麒麟就被他译成了“独角兽”。虞译本在这二者间求得了恰到好处的平衡，译者提供了适量(百十处)注释及人物表，便利于读者理解。对于麒麟一词，虞译本是在音译“Qilin”的基础上添加脚注，说明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速度很快，长得像鹿”，成功地将异化和归化进行了结合，传递出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概念。可以说，和邓罗译本相比，虞译本语言风格活泼生动，符合当代英语文学的用语习惯；和罗慕士译本相比，虞译本没有厚重的学术味，适合一般读者的需求。英语读者的反馈最能说明译本成功与否，亚马逊网站上目前虞译本评分高出前两个译本，读者普遍认为其“晓畅易懂”“更通顺”“保留了原文的感觉”“非常出色”，一些读者指出，虞译本的注释恰到好处，极有利于理解故事，甚至有读者表示，这是“最好的翻译”。

虞译本的成功是译者水平的最好证明，也说明出版社慧眼识珠。联系到时下学界极为关注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值得一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向外传播有效？仅有单方面的意愿不必然带来理想的结果。造成此前一些被动局面，原因大约是多重的，可能与中国译者的语言水平有关，也可能是选择的材料外国人不感兴趣，或者是推广的力度不够等等。相反，外国出版社及译者主导的翻译却贡献了几个颇成功的案例，莫言、王安忆、苏童等作家获得或提名世界性的文学大奖，似乎说明惟有外国人才懂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这样看来，有学者提出的采用中外合作的翻译模式很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虞译本也许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模式：对于那些随时间流逝而老化的译本，与其发动人力财力组织重新翻译，不如选择一个早先的译本进行校译，反而可能获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华师大诞生的翻译家及各种“家”中，虞苏美老师大约称得上最默默无闻的一位，但她的名字似乎注定与“名气”捆绑在一起，这其中可能有运气的成分——毕竟不是谁都能遇到翻译《三国演义》这类书籍的机会，但更多要归功于她所提供的众人可以共同检阅的成功翻译实践。没有任何成功是偶然的，在翻译这个领域内更是如此，而典籍翻译想要取得成功，更不可能依靠一丝运气的成分，可以依靠的惟有译者自身的功力。

世间只有一个写了《飘》的米切尔，也只有一个译了《三国演义》的虞苏美。

翻译家罗玉君

译书一生

沈珂

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对十九世纪经典文学的翻译名家一定不会陌生，林纾、傅雷、李健吾、李青崖、闻家驷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是一种期望用文学启迪民智、用文学陶冶民心，甚至用文字的力量拯救民族的期盼。但在经典作品不断复译、现当代作品持续呈现的今天，更多的、曾经将法国文学大家带入我们视野的翻译家已经渐渐被淡忘，罗玉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罗玉君，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她翻译的《红与黑》了。的确，自巴黎大学著名心理学专家乔治·杜马教授向罗玉君推荐了《红与黑》，她与这本书、与法语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便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从阅读到翻译，从首译到重译，从翻译到出版，这部“撞进了心扉”的作品伴随了她整整三十多个年头，也因此，罗玉君将重译的《红与黑》视作她“生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一次次的复译，迄今的二十多个译本，《红与黑》的汉译已然超越了对个体的意义，而被视作文学翻译的一个典型、一个事件，被关注、被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许钧先生组织的关于《红与黑》大讨论，对罗玉君、郝运、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等五个译本进行过重点比较研究。相较于其它几个译本，罗译本存在着诸如过度阐释偏多、主观随意性偏大，甚至不妥、错译等问题，也不在读者最喜爱的译本之列。但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译本，罗译本于1954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短短几年累计的印刷数量超过100万册。直至1986年郝运译本问世，长达三十年间，罗译本几乎是读者的首选，换句话说，中国读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认识大多是从罗译本开始的。

而另一方面，罗译本中流露出的“主观随意性”，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罗玉君在回忆《红与黑》的翻译经过时，表达了对翻译的看法：“翻译是凭借了原作家的符号去寻找原作家的意象，使这意象重现在眼前，灿烂在眼前。”“意象”与“灿烂”二词或许能为她的翻译选择提供某种佐证。《红与黑》中译者有意无意构建起的追求进步、民主的于连的形象，又何尝不是当时经历过战火硝烟、国家初建、百废待兴的中国读者的一种情感需求，以及罗先生所认为的“艺术的社会性”的体现呢。而就罗先生而言，更不能忽视的是她对翻译的热爱、执著，以及排除万难的坚持。翻译《红与黑》，罗玉君前后耗费十多年之久。在战乱的迁徙流离、漂泊不定中，先生“一直把《红与黑》的原文同译稿带在身旁”，这个“患难中养育的孩子”终于在1947年夏天具备了雏形，而后，她又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校对和部分的抄写，“每天写得腰酸，每天写得手软，写得朵朵黑云，从我眼前飞来飞去”，才将这个难产的孩子最终“哺育成人”，而翻译也如是成了罗玉君人生中最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红与黑》的汉译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机缘，那么翻译乔治·桑则是气质契合的选择。上世纪五十年代，罗玉君先后翻译出版了乔治·桑的六部长篇小说，包括已有前译的《魔沼》《弃儿弗朗沙》，首译的《小法岱特》，两部童话故事《祖母的故事》和《说话的橡树》以及社会小说《安吉堡的磨工》。她还撰文《乔治·桑和她的作品》，介绍其人其作。一系列中译本的问世以及相关介绍文字的发表，掀起了乔治·桑在中国译介的小高潮。

改革开放之后，罗玉君重拾翻译乔治·桑的热情，又出版了《比克多尔堡》和《印典娜》两部译作，而当时，先生已因身体原因退休多年，她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争取一切可能多译介作品。她曾有意翻译30部左右乔治·桑的作品，形成《乔治·桑全集》，并打算撰写《乔治·桑传》，尽管这些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罗玉君常年醉心于乔治·桑作品的翻译，她对这位法国女作家的喜爱体现在每一部译作的字里行间，充盈着悠长的译介旅途。这种喜爱，既有基于性别的，也有基于经历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观念的——她们惺惺相惜，通过作品、文字的“神交”，跨越了语言本身的障碍，达到了气质与精神的契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风格上，乔治·桑以其细腻的笔触、朴素简洁的用词、自然流畅的行文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中独树一帜，这一点与罗玉君本身自然流畅的行文风格颇为贴合。在既忠于原作，又兼顾民族的欣赏和表达习惯的翻译主张之下，罗译的乔治·桑版本不仅广受读者的青睐，也被收入到学校的课本中。

早年的翻译家，常常有两类，作家型的和学者型的，罗玉君应该更偏向后者。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荣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不久，便决定与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丈夫李珩一起归来，报效国家。她先后任教于多所高校，也曾是文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1951年，罗玉君选择随丈夫回到上海，并应聘成为才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专门教授外国文学。她辗转多个城市、多所学校，重又回到文学梦、翻译梦萌芽的地方，她的母校，而这所兼容并蓄的学府，它的“前世今生”已然拥抱和滋养了周煦良、孙大雨、叶治等一批知名的翻译家，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另类的心心相印呢。

进入华师大之后，罗玉君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在教书上。她操着一口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引领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热心指导他们的写作和翻译。同时，她继续潜心译书、研究文学，她的译作与评论总是相伴而生，她的文字既不失女性翻译家的敏锐与细腻，又不乏学者的冷静与理性。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性翻译家、学者，罗玉君以刻苦的态度、出众的能力打破了时代的规约和性别的藩篱。

“教书、译书，这是我的两大事业，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罗玉君这样说过。曾经，她的足迹留在了国内外的多所高等学府，她的翻译文字走进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里，而今，斯人已逝，文字之外，留给我们后辈的，是对翻译这项事业的坚守，对自身所热爱之事物的追求。或许，这种精神力量比文字本身更为珍贵。